

一枚硬币有两面 爱恨交织“孔方兄”

——中国货币的前世今生与文明密码

□唐元春

天地海贝： 原始交换与权力象征的萌芽

在“钱”这个概念诞生之前，先民的世界里，“交易”源于最朴素的以物易物。一头羊换几把石斧，一袋谷物换几尺麻布。然而，这种直接交换受制于强烈的需求双重巧合，效率低下。于是，一种被普遍渴求、便于携带、不易腐坏的中介物——原始货币，应运而生。在世界各地，羽毛、牲畜、玉石、盐巴都曾扮演这一角色。而在华夏大地，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位主角，是来自遥远海洋的馈赠——海贝。

对于生活在内陆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而言，一枚光润坚硬的咸水贝壳，是稀罕且珍贵的。《史记·平准书》记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考古发现证实，在夏商时期的墓葬中，海贝常作为重要陪葬品出现，且出现了以骨、石、玉乃至青铜精心仿制的“仿贝”。这清晰地表明，贝已超越装饰品的功能，成为衡量财富、进行大宗交换的公认尺度。

海贝的印记如此深刻，以至于永久地镌刻在我们的文字基因里。今日所有与财富、交易、馈赠相关的汉字，如“财”“货”“贩”“购”“贷”“赠”“赏”等，皆从“贝”部。一个文字化石，凝固了三千年前的经济记忆。商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登峰造极，出现了铜贝，这是中国金属铸币的肇始，标志着货币制造从自然物加工迈向人工铸造的崭新阶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商族人以善于经商贸易闻名后世，“商人”“商业”的称谓由此传说般流传下来，暗示着一个活跃的商业阶层与初期货币经济的共生关系。

列国金戈： 货币的“春秋战国”与秦朝一统

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进入思想奔腾、列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与此相应，货币形态也迎来了一个自由奔放、百花齐放的“青春期”，鲜明地体现了地域文化与经济格局。

在中原农耕核心区的韩、赵、魏等国，货币脱胎于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布币，其形如铲，又称“铲布”，象征着对土地的依赖与重视。在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流行着造型凌厉的刀币，或许折射了滨海地区的尚武精神或渔猎传统。南方楚地，则沿用并发展了铜贝体系，铸造出面部有铭文、形似鬼脸的蚁鼻钱，充满神秘的巫文化色彩。而西方的秦国，使用的是由纺轮或玉璧演变而来的圜钱，中间有圆孔，已隐约可见后世铜钱的雏形。

这个“货币战国”的局面，生动反映了政治分裂对经济统一性的割裂。商人们穿梭于列国之间，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后来的吕不韦，他们“家累千金”，从事“贩贱卖贵”的跨国贸易。此时，除了形色各异的铜币，黄金作为一种价值极高、易于分割且被各国贵族普遍认同的贵金属，开始扮演国际硬通货的角色，为纷乱的货币体系提供了一种高端锚定物。

历史的车轮由西向东滚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亦需整齐划一。货币首当其冲，秦始皇颁布律令，废除六国旧

“小二，切二斤熟牛肉，烫一壶好酒！”影视剧中，豪侠放下银锭的潇洒动作，早已成为我们对古代交易的经典想象。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剧本复杂。那锭沉甸甸的银子，在绝大多数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并非触手可及的支付工具。从海滨拾取的斑斓贝壳，到青铜铸造的仿贝铜钱；从沉重不便的铁钱，到轻便却危机四伏的纸质“交子”；直至明清时期，白银才真正成为经济血脉的主角。一部中国货币的进化史，绝非简单的钱币形制变迁，而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它交织着政治权力的意志、经济生活的脉动、工艺技术的突破，乃至哲学观念的投射，静静诉说着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如何一步步构建起其复杂而精妙的交换体系与信用世界。



中国古代货币演变与发展简图。

币，以秦国的圜钱为基础，推行“半两钱”。更为关键的是，为了加工方便，防止铜钱在锉磨时滚动，工匠们将中间的圆孔改为方孔，“圆形方孔”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铜钱最经典的形制，被戏称为“孔方兄”。这个小小的设计变更，不仅出于实用，也被后世附会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钱币由此被赋予了贯通天地、周流四方的文化寓意。

五铢与通宝： 帝国货币体系的定型与演进

秦朝国祚短促，其严苛的货币制度并未深入人心。汉承秦制，但进行了关键改良。汉武帝时期，下令铸造五铢钱，重量、成色标准统一，由政府垄断铸造发行，严惩私铸。五铢钱轻重适中，信用卓著，从汉武帝到唐初，通行了七百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奠定了中央集权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钱法”传统。

唐代是一个气象恢宏、对外开放的帝国。成立后不久，即废五铢，行开元通宝。这不仅是钱币名称的改变，更是货币理念的革新。“通宝”意为流通的宝货，此后各朝铸钱多称“元宝”“通宝”，直至清末。钱文也由标识重量的“半两”“五铢”，变为更具吉祥和政治意义的年号加“通宝”。开元通宝规制精良，成为后世铸钱的典范，其影响远播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形成了以中国钱币为蓝本的“东亚钱币文化圈”。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虽以铜钱为主币，但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绢帛等丝织品，因其价值稳定、便于长途运输，同样被法律认可为支付手段，尤其在巨额交易

和财政税收中广泛使用。这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尚未极度发达的中古时期，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并存的过渡性特征。同时，由于铜料短缺和携带大宗铜钱不便的问题日益突出，白银在唐代末年开始更多地进入流通领域，为后世银本位埋下了伏笔。

纸上的革命： 交子诞生与信用货币的艰难探索

如果说铜钱的演进是“实体货币”的完善史，那么宋代则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信用货币”实验。这场革命的舞台在四川。北宋时，四川因缺铜而铸行铁钱，铁钱价低体重，一貫(1000文)铁钱重达数十斤，商旅之苦，可想而知。于是，聪明的成都商人发明了交子——一种用楮树皮纸印刷的存款凭证。商人将铁钱存入信誉良好的“交子铺”，换取一张写明金额、盖有密押的纸券，凭此可在异地联号兑取现钱。这极大地便利了商业汇兑。

很快，交子从单纯的存款凭证，演变为可以独立转让、直接支付的信用货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此诞生。然而，私人发行交子容易导致滥发和信用崩溃。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营，规定了发行准备金(“本钱”)制度。尽管此后因财政需要，宋朝政府屡有超额发行导致通货膨胀的教训，但纸币作为一种划时代的金融工具，其地位已经确立。

元朝继承了纸币制度，并一度将其推向极致。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初期以白银为储备，信用颇佳，并曾立法禁止金

银铜钱流通，力图实现纯纸币经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用树皮造之纸币”竟能通行全国，购买万物，惊叹不已，将其详细记录在游记中，成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先进金融制度的珍贵文献。然而，元朝后期为弥补财政赤字而滥发纸钞，终致恶性通胀，信用破产，这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白银时代： 全球贸易与明清经济的货币底色

明朝开国，朱元璋试图重建纸币权威，发行大明宝钞。但朝廷只发不收，没有充足准备金、且禁止宝钞兑换金银，很快使其沦为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迅速贬值成为废纸。官方货币信用的失败，反而为白银的崛起扫清了障碍。明朝中期，随着官方用银禁令的松弛，以及一条鞭法赋役折银改革的推行，白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地确立起来。巨大的银锭(元宝)、碎银子成为日常大额交易和财政结算的核心。

明代白银的广泛使用，并非完全内生的结果，其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全球贸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精美的瓷器、丝绸、茶叶源源不断输往海外，换回了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巨流。著名经济史学家称之为“白银资本”的时代。中国被深度卷入早期全球经济体系，白银的流入支撑了明清两代经济的商品化与繁荣，也使得中国经济脉搏与遥远墨西哥、秘鲁的银矿产量产生了隐秘的联动。

清朝大体沿袭明制，银、钱并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直至晚清，外来机制银元(“鹰洋”“站洋”等)凭借成色、重量标准统一的优势，冲击中国市场，清政府也开始自铸“龙洋”。与此同时，为应对困局，清政府再度发行官方纸币“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民间合称“钞票”——这个词，便成为后世对纸币的通称。随着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和现代金融观念的引入，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新传统铜钱与银两制度，最终在机器轰鸣声中，缓缓落下了帷幕。

从实体到符号，从权力到信用

回望这段跨越三千年的货币长河，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文明成长的编年史。货币的形态，从具象的自然物(贝)，到模仿自然物的金属铸币(铜贝)，再到脱离原形、完全人工设计并承载政治权威的符号(半两、五铢、通宝)，最终演变为几乎完全依赖国家信用背书的纸张符号(交子、宝钞)。这个过程，是交换经济不断抽象化、复杂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并试图掌控经济命脉的过程。

每一枚锈迹斑斑的古钱，都曾是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它可能是汉代边卒的饷银，唐代胡商的货款，宋代书生赶考的路费，或是明清徽商汇兑的汇票。它流通于市井阡陌，沉淀于王朝国库，也随葬于贵族墓穴。它既是最世俗的欲望载体，也曾被赋予最玄妙的哲学意味(天圆地方)。

今天，当我们滑动手机完成一次数字支付时，那瞬间完成的交易背后，是数千年人类对价值衡量、信用构建与交换效率的不懈探索。中国货币史留下的，不仅是古钱币学上的珍品，更是一笔关于金融智慧、制度教训与文化积淀的宝贵遗产。它告诉我们，货币的本质不仅是财富，更是信用；不仅是经济的工具，更是文明的刻度。从海贝到区块链，形式天翻地覆，而人类对建立可靠、高效价值交换体系的追求，从未改变。